

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

杨天石

内容提要 在孙中山著作和国民党“一大”文件中,确实没有“三大政策”这一概念,但是,这一概念所包括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又确实都来源于孙中山,是在特定环境下,从特定角度对于孙中山晚年思想和主张的一个比较精炼的概括。

一个哲人的身后常常有无尽的关于这一哲人的争论。“三大政策”概念的提出,发端于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的批判。它有一个长达一年有余的熔铸、提炼过程,在此期间,跨党的中共党员沈雁冰、施存统、陈独秀、周恩来,国民党左派柳亚子等人,以及国民党上海左派组织、黄埔左派学生、中共广东区委、中共中央等都发挥过作用。

关键词 孙中山 三大政策

多年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直被认为是孙中山晚年思想的重要方面,也是区分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标准,但是,由于孙中山著作和国民党“一大”有关文件中从未出现过“三大政策”一类提法,因此,学者们不能不关注这一概念的形成、提出时间以及它的背景。在这一方面,日本学者狭间直树、石川祯浩,台湾学者蒋永敬,大陆学者黄彦、鲁振祥、张海鹏等人都

做出了贡献。^① 本人多年来也一直关注这一问题,今据中国国民党上海市左派组织所编《中国国民》,结合其他资料,略述己见,希望有助于厘清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

反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过程中提出的问题

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曾经寄希望于许多西方国家的支援,但是久无实效。十月革命后,孙中山转而寄希望于俄国,逐渐形成“联俄”政策。1921年中共成立,在共产国际推动下,孙中山又逐渐倾向于容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这就是所谓“容共”政策。但是,从一开始,国民党内部对这两项政策就有不同意见,只是由于孙中山的威望,没有形成大的风波。孙中山逝世后,反对的意见和呼声日渐增强。于是先有1925年7月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书的出版,继有同年11月西山会议的召开。这样,国民党的党内斗争就日趋激烈了。

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戴季陶尖锐地指责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有关政策是“寄生政策”,认为“真正的国民革命”,要“真实的国民革命主义者,才可以指导得来”。^② 他一方面承认CP和CY“真是为民众的幸福而奋斗的勇士”,但是,同时又“苦心孤诣”地希望CP和CY,“要真把三民主义,认为唯一的理论,把

① 参见狭间直树《“三大政策”与黄埔军校》,《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石川禎浩《施存统と中国共产党》,(日本)《东方学报》第68册,1996年3月;蒋永敬《“三大政策”探源》,(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3期;黄彦《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鲁振祥《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中华书局1989年版;张海鹏《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若干史实的解说》,(台湾)《历史月刊》1998年第2期。

②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1925年上海季陶办事处印赠,第52页。

国民党认为唯一救国的政党”，要求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空想，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① 这样，戴季陶这一时期虽然还并不反共，但是，却不允许共产党人跨党，和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有了很大不同。同书中，戴季陶还提出：“中国在图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由上，有很亲切联俄的必要，并且在参与世界革命运动上，尤其有和苏联共同努力的必要。但是中国人总要看清楚自己的需要，尤其是要尊重自己的独立性，不可把自己民族的独立性抛弃了，去依赖苏俄，更不可把自己的必要忘记了去盲从苏俄。”^② 这一段话表明，戴季陶这时候还不反对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但是，他对这一政策已经持有怀疑态度。戴书的出版标志着戴季陶主义的形成，上海部分国民党人迅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出版《革命导报》，以为响应。

1925年11月23日，林森、邹鲁、谢持等人在北京西山召开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继续宣扬戴季陶主义的有关观点。会议攻击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作用”，声称国民党不容“党中有党”，“不容共产党利用本党的招牌来鼓吹阶级革命”，“不能再容共产派篡窃”，等等，会议要求跨党的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国民党，使两党党员的“旗垒划然分明”。^③ 会议同时声称，当时的广东，“军政大权实已完全在俄人掌握之中”，“若是苏俄采用帝国主义的手段，那当然也是本党的敌人”。^④ 在此基础上，会议通过了一系列议案，如“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顾问鲍罗廷解雇”、“惩戒汪精卫”、

①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第57页。

②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第71页。

③ 《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58、377、384页。

④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383、386页。

“变更联俄政策”等。3月29日,张继、林森、邹鲁等77人进一步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通过了一系列文件和议案。其核心主题仍与西山会议相同,只不过提法上更为激烈。例如,明确批评苏俄的外交政策“犹带有帝俄时代之遗传病”,声音既反对“笼统的仇俄”,也反对“盲目的亲俄”,批评中共“盲目模仿苏俄”等。^①又如,批评中共的“阶级斗争”主张“不合社会之需要”,“至易破坏国民革命”,甚至批评中共“暗中截断本党与民众之生气,毁坏本党之信仰”,“直接助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摧残革命势力”,等等。^②本来,西山会议派对中共还比较客气,仅仅要求取消“共产党”的国民党党籍,但仍可视为“友党”,说是“理势所不得不分,而情谊未始不可合”。^③但是到了中山舰事件后,就发展为要求“驱除党寇”,“缉拿共产党徒”了。^④可以看出,西山会议派的议案虽多,但核心只有两项,即改变孙中山生前所定而为当时广州国民党中央所执行的“联俄”与“容共”两项政策。

戴季陶和西山会议派的思想、主张遭到了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强烈批判。在这一过程中,“三大政策”的概念逐渐形成并提出。

沈雁冰概括孙中山的“民族革命运动政策”, 包含了后来“三大政策”的全部内容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上海成立执行部,负责指导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海),《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400、403页。

②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403—404页。

③ 《取消共产党在本党之党籍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357页。

④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419、425页。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党务，同时兼管湖北、四川、湖南、贵州四省。上海执行部之下，设各区党部联合委员会。^①1925年5月25日，该会出版《中国国民》周刊，成为上海国民党左派的言论喉舌。同年10月7日，时任国民党上海第一区党部委员的沈雁冰（当时是共产党员）在该刊发表《苏俄十月革命纪念日》一文。文中除热烈赞扬列宁的“实现世界革命的政策”外，还热烈赞扬孙中山的“民族革命运动政策”。他说：

然而世界两大革命潮流之一——东方民族革命运动也有他的唯一伟大的革命导师！这便是本党先总理孙先生！正像列宁的炯眼早看到世界革命的实现必待东西两大革命之携手，先总理的炯眼也早看到东方民族革命之实现必须外与西方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战线，内则扶植农工阶级的阶级势力而后有济！所以先总理于前年改组本党之际，毅然决然容许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共同革命。所以先总理不顾帝国主义者的造谣中伤而毅然决然与苏维埃俄罗斯携手。所以先总理于广州商团之变及其他无数的劳资争端与农民反抗地主的事项中，都制止资本家与地主的剥削压迫而扶助农工，组织自卫。迄今总理虽亡，而读遗嘱，翻遗著，我们都可以看见总理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政策，如日中天，江河行地。^②

文中论及“容许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与苏维埃俄罗斯携手”、“扶助农工”，后来作为“三大政策”的全部内容，在这里都提到了。

同年12月3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发表文章，分析国民党左右派时称：“在策略上：左派懂得要实现反对帝国

① 后来改称中国国民党上海各区党部联席会。

② 《中国国民》第2期。

主义与军阀的国民革命,国外有联合苏俄国内有联合工农阶级及共产党之必要;右派则反对联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阶级之阶级利益的争斗而失其同情。”^①这一段话,比沈雁冰上文精炼,但是,没有明确地和孙中山挂钩。类似的情况也表现在12月4日国民党中央发表的《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同志之通告》中。该《通告》在批评冯自由、邹鲁等人的主张后,明确说明,“联俄与容纳共产分子”是“本党求达到革命成功之重要政策”,“先总理决之于先,第一次全国大会采纳于后”。接着,通告论证说:

若本党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联合苏俄,不以占大多数的农工阶级为基础,不容纳主张农工阶级利益的共产派分子,则革命势力陷于孤立,革命将不能成功。^②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文件有“全力”扶助农夫、工人运动发展的明确内容;《宣言》甚至声称,国民党的事业,目的在于“谋农夫、工人之解放”,“为农夫、工人而奋斗”。^③孙中山在1924年的相关演说中也表示,“要农民来做本党革命的基础”,工人“可以做全国人的指导”。^④因此,《通告》所称“以占大多数的农工阶级为基础”云云,也明显地依据孙中山的晚年思想和“一大”文件。这在当时,极为明白,也极易理解,《通告》之所以没有在两者之间“挂钩”,其原因当在此。

陈独秀的文章和国民党中央的通告,一发表于上海,一发表于广州,时间上只相差一天,没有彼此影响的可能。这说明,当时两党高级领导人之间对革命策略的认识相当默契。

① 《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向导》第137期。

② 1925年12月5日《广州民国日报》。

③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1、124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9、555页。

12月23日,沈雁冰继续发表文章称:“孙总理所定的策略便是对外联络世界上革命的无产阶级,对内扶助本国的农工,培养农工阶级的势力,以增厚反帝国主义的力量。这个策略已见之实行者,是联合苏俄与容许中国共产党分子加入国民党。”^①这段话,指明是孙中山所定策略,也说得精,很概括,但是,没有明确地形成“三个政策”的概念。

柳亚子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
沈雁冰总结为“总理的两个重要政策”

沈雁冰的《苏俄十月革命纪念日》一文没有和戴季陶正面论战,同时发表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呈文及辩正文章则鲜明地批判戴季陶的观点。江苏省党部认为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有五大错误:其一是误认孙中山思想发生于中国“数千年的旧文化”,其二是误认孙中山思想的根本意义是“仁爱”,其三是否认阶级斗争。文章在论述第四个错误时说:

中山先生的主义所以与欧美各国的民主主义之仅代表资产阶级者不同,所以能为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指导,便在特别努力于促进工农阶级有意识的集中和发展。

又在论述第五个错误时说:

中山先生要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力求农夫、工人之参加,所以允许为工农阶级自己的政党之共产党得以跨党加入国民党。^②

① 《总理指示的一条路》,《中国国民》第13期。

② 《对于戴季陶同志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误点的辩正》(连载之二),《中国国民》第4期。

由于戴书反对“联俄”观点还不很明晰,所以文章仅论及“扶助农工”和“容共”两大政策,而没有涉及“联俄”。

11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出林森、覃政、戴季陶、邵元冲、叶楚傖、沈定一、张继等人电报,决定在北京西山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同时刊出该会《筹备处启事》,标志着上海《民国日报》的转向。29日,《中国国民》自第5期起改为三日刊,更加着力于批判西山会议派。

《中国国民》在和西山会议派论战时,除陆续发表共产党人恽代英、杨之华、张国焘的文章外,特别注意发表国民党元老的文章。12月2日、20日,先后发表杨谱笙的《致国民党青年同志书》和张静江的《告国民党同志书》。29日,发表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宣传部长柳亚子的《告国民党同志书》,着重论述“联俄和容纳共产分子,都是本党总理孙先生的遗训”。文章首引孙中山遗嘱中“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一语,说明“现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除了苏俄,还有哪一个?”文称:

我们要国民革命成功,要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完成我们民族主义,当然非联俄不可了。同时,苏俄帮助我们,一方面是要巩固他们的立国信条,一方面是要雄厚他们作战的阵线。

在论述“容纳共产分子”时,柳亚子引述孙中山遗嘱中的“唤起民众”一语,说明“所谓民众,当然包括着全国国民中间最大多数的工农阶级了”。文称:

要国民革命成功,非把工农阶级宣传和组织起来,使他们加入革命的队伍,是没有第二个办法的。同时,共产党是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政党,既然要吸收工农阶级,绝对无排斥共产分子加入本党的理由。

柳亚子表示:“排斥共产分子,就是断本党新生命,就是阻挠国民革

命的成功,老老实实说,就是总理的罪人,也就是本党的公敌。”^①

柳亚子的这篇文章实际上讲了孙中山晚年政策的三个方面,但是由于他把“宣传和组织”工农以及“容纳共产分子”糅合在一起讲了,所以,沈雁冰在推荐这篇文章时便把它概括为“总理的两个重要政策”。他在题为《柳亚子同志的至理名言》一文中称:

我们敢说,凡是国民党党员读了亚子同志的文章,而犹怀疑于联俄与容纳共产派——总理的两个重要政策——那他不是神经系统有点毛病,便是反动派。

上文表明,沈雁冰虽然已经从三个方面概括了孙中山的政策,这里,又提出“两个重要政策”,一方面是随文就义,按柳亚子的思路在写文章;另一方面,也说明沈雁冰在进行概括时还没有想得很清楚。

由于西山会议派的责难主要指向“容共”与“联俄”,因此,孙中山的“两个重要政策”的提法曾经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流行过。1926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在《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中说:“中山先生看清了国内无产阶级的共产派有党内合作之必要而无危险,看清了国外无产阶级的苏俄必然以平等待我而无所疑虑,才决定联共、联俄这两个特殊的革命政策。”^②5月22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闭幕演说中,蒋介石也曾表示,绝不改变“先总理的两大政策——联俄和容纳共产分子”^③。

① 《中国国民》第15期。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

③ 《蒋校长演讲集》,第81页。4月7日,广东孙中山主义学会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时也说:“对于总理手订之两大革命策略,尤不敢有丝毫怀疑。”见《政治周报》第10期。

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施存统首次提出 “三大革命政策”概念

在上海《民国日报》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先后为西山会议派掌握后，广东国民党中央委派恽代英、张廷灏、刘重民三人为中央特派筹备员，筹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1926年元旦，上海特别市党部在上海大学召开成立会。选举张廷灏、恽代英、林钧、杨之华、沈雁冰、杨贤江、王汉良、张君谋、陈杏林等9人为执行委员；议决扩大《中国国民》的篇幅，移交市党部直接办理。市党部下设宣传、组织、商人、妇女、工农、青年、调查7部，分别以恽代英、张廷灏、王汉良、杨之华、陈杏林、杨贤江、沈百先为部长。1月10日，市党部各部联席会议，确定施存统、杨贤江、恽代英等13人为宣传委员。

1926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当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青年部出版《总理周年纪念特刊》，施存统（当时是共产党员）以“复亮”为名发表《中山先生的三大革命政策》一文，空前明确地提出了“三大革命政策”的概念。文章说：

这个实现“中国之自由平等”的方法，也已由我们中山先生指示出来了。这就是中山先生的三大革命政策：团结工农势力，联合苏俄，容纳共产派。现在的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已经很忠实地很勇敢地继承中山先生的这三大革命政策了，所以它的基础一天稳固[了]一天，它底势力一天强盛一天，它底运动一天扩大一天，它底工作一天有效一天，全国被压迫的革命民众集中于它的旗帜下面的一天多似一天，帝国主义及军阀对于它底势力一天寒[害]怕一天。

文章并以广东国民政府的成立和国民革命军的发展为例，说明“这些都是证明先生这三大革命政策的成功，即以后的成功亦必须忠

实地遵守这三大革命政策”。

在分述三项政策后,施存统称:“以上这三个革命政策,可说是完成国民革命的根本政策,缺一不可。这三大革命政策,是中山先生积四十年的革命经验所得到的,亦就是国民革命的保障。我们若违反这三大革命政策之一种或全体,那就是中山主义的叛徒,不配冒称为中山主义者。”

施存统的文章并非无源之水。2月16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曾经转发过中共中央的一份《孙中山先生纪念日宣传大纲》。这份大纲提出,孙中山逝世日,“应是国民革命最广大的宣传日”。大纲称:“借孙文主义之名,而行破坏统一的国民革命之实,不是真正孙文主义的信徒,乃是孙文主义的叛徒”。《大纲》特别要求,在国民党广州中央之下“遵从孙中山先生一切主义和政纲”。关于“政纲”,文件特别以括弧举例说明,“如联俄,集中革命势力,如容纳共产分子等”。^①显然,施存统写作《中山先生的三大革命政策》一文,乃是为了贯彻共青团中央转发的中共中央文件精神,只不过他没有照抄照搬,而是加进了自己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3月12日,中共中央在《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中虽有孙中山“两个特殊的革命政策”这一提法,但是,同文中在分析国民党内部分化的原因时还曾说:“企图联合无产阶级,遂不得不采用容纳共产派联俄拥护农工利益等革命政策;企图结合资产阶级,遂不得不修正联共联俄政策及提出阶级调和口号。国民党左右派乖离的真正原因完全在此。”这里,实际上将孙中山的晚年政策概括为三个方面了。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48页。“如联俄,集中革命势力”一语中的逗号为笔者据文义所加。

柳亚子发表《揭破伪代表大会的真相》，将“两个政策” 的提法改为“三个革命的重大政策”

西山会议派召集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3月29日在上海开幕。30日，《中国国民》出版《反对叛党分子之代表大会特刊》，猛烈攻击该次会议。在这一期特刊中，柳亚子发表《揭破伪代表大会的真相》一文，他说：“我们对于这一个伪代表大会，要解剖他的内容，从政策、纪律、事实三方面，来证明他们确实是反动，确实是非法，确实是捣乱，确实是本党的蠹贼，确实是总理的叛徒。”文章的最重要之点是将他原来的“两个重要政策”修改为“三个重要政策”，他说：“总理的革命政策，可分为三大点，第一是联合世界上的革命民众，第二是集中全国内的革命势力，第三是团结革命的基本队伍。”接着，他对这“三大点”分别作了论证。文章说：“为联合世界上的革命民众而联俄，是总理第一个重要的政策”；“为集中全国内的革命势力而容纳共产分子，是总理第二个重要政策”；“为团结革命的基本队伍而拥护工农阶级，是总理第三个重要政策”。柳亚子并说：“这三个重要政策，是决定于总理生前的”。

柳亚子激烈地指责西山会议派：

所谓西山会议，居然反对联俄，说是媚外卖国，居然反对容纳共产分子，说是本党确受蚕食的危险，更居然反对拥护工农阶级利益，说是提倡阶级斗争，那不是明明白白反对总理的政策吗！

文章又说：

大家要晓得，总理积四十年经验，才苦心孤诣，定下了这三个革命的重大政策，而他们敢于反对他，敢于诬蔑他，更敢于破坏他，只此一点，便足证明他们的反动，证明他们是本党

的蠢贼，证明他们是总理的叛徒了。

将柳文和施文比较，显然，柳亚子读过施文，并且接受了它的影响，但是，柳文依“联俄、容共、拥护工农利益”的层次叙述“三大政策”，显然更接近后来的提法。

据柳亚子回忆，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他曾以“三大政策”为武器，在广州当面批评蒋介石：“到底是总理的信徒，还是总理的叛徒？如果是总理的信徒，就应当切实地执行三大政策。”^①证以上引柳亚子文所提孙中山的“三个重要政策”，他的这段回忆应该是可信的。

《声讨反动派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传纲要》 再次阐述孙中山晚年“最重要的革命政策”

1926年4月1日，《中国国民》周刊第1期出版，公布了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颁发的《声讨反动派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传纲要》，共7条，其第二条称：

西山会议所要求的无不处处与本党进步的革命政策相抵触。本党总理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中国自由平等之目的在唤醒民众与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故注重农工利益与联合苏俄，同时为集中革命势力，又主张容纳共产派分子加入本党。所以注重农工利益、联合苏联、容纳共产派分子是本党总理晚年所决定之最重要的革命政策之一。凡是中华民族解放之忠实努力者都知道这种革命政策是正确的，并已卓著成效。乃召集西山会议的人反正〔而〕要推翻此种政策，其违背总理遗教，反叛革命可想而知。

① 《磨剑室文录》（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4页。

这里,将“农工”问题列为首位,和柳亚子文将“联俄”列为首位不一致,却和较早的施存统文一致,但是,《纲要》将“三项重要政策”说成“本党总理晚年所决定的最重要的革命政策之一”。这种情况,说明当时施、柳的说法还没有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也说明二人的说法并非来源于集体讨论所形成的决议。

陈独秀精炼地概括孙中山的“革命政策”,
距后来提出的“三大政策”概念实际内容已经相差无几

1926年7月6日,陈独秀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批评在蒋介石领导下匆促作出的北伐决策。此举引起蒋介石、张静江等国民党人强烈不满。9月13日,陈独秀写作公开信,答复张静江等人,内称:

凡是尊重国民政府的人,应该要求他有高度的革命性。事实是怎样呢?中山先生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这样来革命,其结果怎样呢?^①

上文述及,当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在《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中已经将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归纳为“容纳共产党联俄拥护工农利益”,这里,陈独秀则将其概括为“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次序上小有不同,其最重要的变化是将“容纳共产党”改为“联共”。在此之前,上引《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曾偶见“联共”一词,但与“拥护农工利益”、“联俄”并称,这是第一次。显然,陈独秀这里的提法和后来提出的“三大政策”的实际内容已经相差无几了。

陈独秀将“容共”改为“联共”,其理由,应基于当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信》,其中透露了国

① 《答张人杰符筠黄世见冥飞》,《向导》第171期。

共合作之初与孙中山的协商情况,信称:

唯是合作之方式:或为党内合作,或为党外合作,原无固定之必要……然当本党决定合作政策之初,曾商之于贵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以为党内合作则两党之关系更为密切,本党亦认为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只是相互关系,现亦可适用此种合作方式,故毅然决定,令本党得加入贵党,同时,本党与贵党结政治上之同盟。^①

这样,陈独秀自然认为“联”字比“容”字能更准确地表现两党关系的实质了。

孙中山的“容共”是两党合作的一种特殊形式,包含着“联共”的意义,这一点,当年的蒋介石也是这样认为的。1926年3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闭幕后,他在广州全市国民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特别声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系增加革命力量,两党合作携手,中国革命前途,有希望成功。”^②“两党合作携手”不是“联”,是什么?

黄埔同学会机关刊物《黄埔潮》 同时出现三篇提倡“三大政策”的文章

1926年10月3日,黄埔军校黄埔同学会的机关刊物《黄埔潮》第11期同时出现提倡“三大政策”的三篇文章。其一为军校学生、经理第一队队员吴善珍的《我们对总理的联俄联共政策怀疑吗》,中称:

自总理决定“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以后,党内新旧的右派……如西山会议、上海伪中央、孙文主义学会——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41页。

^② 1925年5月25日《广州民国日报》。

他们的宣言决议案,完全以反对此三大政策为骨干……但是,黄埔学生有始终拥护此三大政策的精神,并且以此作评判革命反革命的根据。

同期发表的余洒度和游步瀛的文章都述及“三大政策”。余文提出:“确遵总理对革命的三大政策。A. 联俄, B. 联共, C. 拥护农工利益”,称之为“革命的方法”。游文提出,必须接受“孙文主义和孙中山先生所手定的‘联俄’、‘联共’、‘农工’三政策”。文章自署作于1926年8月20日。

如果说第11期的三篇文章还只是表达个人观点,那么第12期的《最近宣传大纲》表达的则是黄埔同学会的集体意见。该《大纲》制订于当年10月5日,它声称:

及至十三年本党改组后始进了一个新的巩固的时期,制定应付时局的政纲及政策,提出适应时局的口号,确定“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本党在民众中始取得领导的地位。

同期发表的《本会庆贺第四期同学毕业》一文则明确提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总理订下‘联共’‘联俄’和‘农工’三大政策”,“这是我们唯一无二的革命策略,是我们今后唯一革命之路,也就是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分水岭”。

《黄埔潮》的观点得到了陈独秀的肯定。同年11月4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上报告称:

黄埔军校中,自我们同志一百六十余人退出后,左派学生在我们指导之下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发展到广大中去,又企图扩大到全国;他的政纲是迎汪复职,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①

陈独秀所述“左派学生”当即指在《黄埔潮》发表文章的吴善珍等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426页。“广大”,指广东大学。

人,他所述“在我们指导之下已经组织起来”,则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这些“左派学生”是受中共领导的。

11月7日,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任卓宣在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第30期上发表文章称:“至于国民党的改组,五卅之反帝运动,广东革命基础之巩固,皆不是偶然的。任何一个有觉悟的革命者,都可以看得出,这是孙中山联俄、联共及工农三大政策之结果。”^①任卓宣的文章表明,中共广东区委支持黄埔“左派学生”的观点。这以后,《广州民国日报》也开始出现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宣传了。^②

施存统1926年秋到广东任中山大学教授,同时任黄埔军校教官。黄埔的“左派学生”接受并宣传“三大政策”,应该和他在军校的教学生涯有关。^③从吴善珍等人发表的文章看,它们和施存统当年3月在上海发表的文章之间也存在着某些联系。例如,吴文论及西山会议、上海伪中央、孙文主义学会,这正是施存统文章的写作背景;他将“三大政策”称为“革命的方法”,这正是施存统前引文中的观点。

恽代英在1929年曾经说过:“孙中山本人的著作中,并无所谓三大政策之一名词,这一名词据我所知,还是周恩来在三月二十以后,为黄埔左派制造出来的。”^④1926年下半年,周恩来正在广州担任广东区委军事部长,领导黄埔军校的共产党人应是他的工作范围。当年10月14日,他还对吴善珍所在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作

① 《我们对于十月革命应有的认识》,《人民周刊》第30期,1926年11月7日。

② 《新闻记者联合会孙中山先生诞日纪念宣传大纲》,1926年11月11日《广州民国日报》。

③ 施本人也曾于1926年12月31日撰写《孙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继续宣扬“三大政策”,见1927年1月14日《广州民国日报》。

④ 《施存统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布尔什维克》第2卷第5期,1929年2月。

过《武力与民众》的报告。恽代英所称“黄埔左派”，当即陈独秀报告中所称“左派学生”。这里透露出来的讯息表明，周恩来在“三大政策”的概括和传播方面，有一份贡献。1926年12月1日，他在写作《现时政治斗争中的我们》时即已公开提出，国民党左右派在对待“三大革命政策”上根本对立^①；在此之前，他向黄埔学生传播这一概念是完全可能的。

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将“三个政策”写入决议

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通过《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的决议案》，中称：

所谓左右乃比较之词，并没有固定的界说，社会的左右派和一个政党内的左右派既然不能混同，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国民党左派，现在又还未成胎，所以只好承认一些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联俄联共和辅[扶]助工农这三个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②

这是“三个政策”这一概念正式进入中共中央决议，并以之作为区分国民党左右派标准的开始。至1927年，蒋介石逐渐右转之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愈广，“三个政策”也逐渐被“三大政策”的提法所代替了。

结 语

孙中山的晚年，其思想与早年有其一贯之处，但是，也确有若

① 《人民周刊》第37期，1927年1月4日。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573页。

干新成分。如何认识、总结孙中山的思想及其前后发展,成为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各政治派别论战的重要焦点。前人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一个哲人的身后,常常有无尽的关于这一哲人的争论。这种情况,自古如此。

如上所述,“三大政策”这一概念形成于1925年10月至1926年末国民党的内部斗争中。它是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对孙中山晚年所行政策的一个比较准确的概括。应该承认,所概括的三个方面确实都来自孙中山,不是贻品;也应该承认,三个政策均为孙中山晚年新增,而为前期、中期所无,反映出孙中山晚年思想和政治主张的新发展。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在作出这一概括时有一个从“二”到“三”的发展过程。其最初的目的是反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后来则是为了反对蒋介石等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民党上海区党部联合会、上海特别市党部、中共广东区委、中共中央,以及沈雁冰、施存统、柳亚子、陈独秀、周恩来和黄埔军校的“左派学生”们都起了作用。

附记:本文写作中,承日本神户大学石川禎浩教授赐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青年部出版的《总理周年纪念特刊》,谨此致谢。

[作者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责任编辑:曾学白】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No. 1, 2000

The Formation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Sun Yat-sen's "Three Great Policies" Concept *Yang Tianshi*(1)

Though there is no mention of the "Three Great Policies" in Sun Yat-sen's works and the documents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Kuomintang, the contents the concept really came from Sun Yat-sen. It is, in the given background, from the specific angle, a terse summary to Sun Yat-sen's thoughts and doctrine in his late period. The concept of the "Three Great Policies" originated from the criticism to "Dai Jitao Doctrine" and the Western Hills Group, with a forming process of more than one year. In this very period,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uch as Shen Yanbing, Shi Cuntong, Chen Duxiu, Zhou Enlai, and some left-wing members of the Kuomintang, such as Liu Yazi, played important roles, the Shanghai left-w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Kuomintang, left-wing students in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Guangdong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lso did the same.

On The Jiangsu & Shanghai Financial Committee in 1927 *Wu Jingping*(20)

The nature and role of the Jiangsu & Shanghai Financial Committee, established in March 1927, comprised mainly of the figures of Shanghai financial circles at the core, were changing with the lapse of time. At the initial stage, the committee was only a unit designated by Chiang Kai-shek for raising money, and yet without the character of a government apparatu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Nanking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he committee became the financial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of it. By means of raising money and issuing treasury bonds, the committee laid the most principal financi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Government. From the end of May until the disbandment of the committee in August, it ceased to be a financial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but responsible for the issue of the treasury bonds